太平洋岛国的中国新移民规模与结构比较研究*

——以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为例

吕建英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太平洋岛国的中国新移民总体规模不大，但其结构特征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文章以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为考察对象，利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1990—2024年国际移民存量数据，对三个国家中出生地为中国的移民人数变化、其在全部国际移民中的占比以及性别构成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三个国家的中国新移民长期保持较小规模，1990—2024年整体变化较为平稳，2015—2024年也未出现快速扩张，且在全部国际移民中的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三个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结构差异，可分别概括为“稳定定居型”（斐济）、“家庭依附型”（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小规模男性偏高型”（汤加）。

关键词：中国新移民；太平洋岛国；国际移民存量；人口结构

作者吕建英，五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太平洋岛国研究。地址：江门市，邮编529020。

一、引言

太平洋岛国人口规模普遍较小，但其在南太平洋地区政治、经济与区域事务中的地位较为特殊①。从文化地理角度看，太平洋岛国通常可分为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三大区域。

就历史过程而言，太平洋岛国并非封闭和静止的区域，而是在长期海上往来、殖民扩张、劳工迁移和商业交流中不断形成的海洋社会②。移民并非太平洋岛国历史中的边缘现象，而是其社会形成和经济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历史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太平洋岛国的中国新移民，处于太平洋岛国华人迁移的较长历史脉络之中，同时又呈现不同于近代契约劳工的新特点。

已有关于太平洋岛国华人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海外华人历史研究和人类学研究，重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5年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下的中国—太平洋岛国教育合作路径研究”（批准号：2025GXJK0063），2024年江门市基础与理论科学研究类科技计划项目“互联网时代下江门市年轻一代华侨的语言身份认同研究”（批准号：20240300014300122O8）和2025年五邑大学人文与政法学院区域国别研究专项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太平洋岛国防灾减灾合作的话语体系建构与国际传播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①Naciones Unidas：“SIDS Accelerated Modalities of Action（SAMOA Pathway）”，https://www.un.org/ohrlls/sites/www.un.org/ohrlls/files/somoa_pathway.pdf.

②Paul D’Arcy，*The People of the Sea：Environment，Identity，and History in Oceani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6.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点讨论早期华工迁移、华人社区形成、文化延续与地方适应[①]；二是传播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关注当地媒体、社会舆论和国家关系中的“华人”或“中国人”形象[②]；三是基于联合国等国际数据库的统计研究，利用按“出生地”统计的国际移民存量数据，对中国来源移民在不同国家的数量变化进行比较[③]。这些研究为理解太平洋岛国华人移民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有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新移民的规模、比例和性别结构仍有进一步比较的空间。与此同时，既有讨论中也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即将按“出生地”统计的中国移民、按国籍统计的中国公民和按族群身份认同统计的华裔人口进行综合考虑，从而造成研究对象边界不够清晰。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为主要案例，利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1990—2024年国际移民存量数据，对三国的中国新移民的规模变化、在全部国际移民中的占比和性别结构进行比较[④]。本文的重点不是泛泛讨论所有华人或华裔群体，而是考察按“出生地为中国”这一统计条件能够观察到的中国来源移民存量，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其结构差异。

二、太平洋岛国的中国新移民的历史背景与统计途径

中国人迁移至太平洋岛国具有较长历史[⑤]。18世纪已有部分中国手工业者、水手和商人随欧洲商船进入太平洋地区；19世纪初，一些从事檀香、海参等贸易的中国商人因经营需要在当地停留或定居，成为较早进入太平洋岛屿社会的中国移民。1840年以后，随着契约劳工制度发展，前往太平洋岛国的中国劳工逐渐增加，并在若干岛屿社会中形成华人社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太平洋地区部分华人社会继续发展，华人社团和商业网络也逐渐出现[⑥]。太平洋战争时期，区域人口流动和华人社会发展受到冲击。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中国移民以及部分东南亚华人又陆续进入太平洋岛国。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太平洋岛国的中国新移民呈现新的特点。相较于早期以契约劳工为主的移民，这一时期的中国新移民更多与市场机会、个体经营、工程项目、亲属网络和家庭团聚有关。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虽然在国家规模、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方面存在差异，但均可作为观察太平洋岛国的中国新移民的重要案例[⑦]。

不过，在研究这一群体时，首先需要明确统计条件。联合国国际移民存量数据通常以“出生地”作为识别移民来源的重要依据，即统计出生于某一国家而居住在另一国家的人口[⑧]。本文对太平洋岛国的“中国新移民”的统计观察，主要依据“出生地为中国、现居目的国”这一条件展开。该条件具有较好的跨国可比性，能够支持不同国家之间的规模、比例和性别结构比较。

同时，这一统计条件也存在需要注意的边界。第一，其反映的是特定年份的存量，而不是年度流量，不

---

①Paul D’Arcy，*The Chinese Pacifics：A Brief Historical Review*，*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Vol.49，No.4，2014.

②鞠长猛：《大洋洲岛国的早期华商及其历史影响探析》，《八桂侨刊》2019年第2期。

③费晟：《南太平洋岛国华人社会的发展：历史与现实的认知》，《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1期。

④Charles C. Ragin，*The Comparative Method：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

⑤Encyclopaedia Britannica：“Pacific Islands”，https://www.britannica.com/place/Pacific-Islands.

⑥David Y. H. Wu，*The Chinese in Papua New Guinea：1880-1980*，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1982.

⑦World Bank Group：“Pacific Possible：Long-term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5813.

⑧United Nations，*Recommendations on Statis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Revision 1，Statistical Papers Series M*，No.58，Rev.1，New York：United Nations，1998.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能直接说明某一年实际迁入多少人。第二，其不能精确识别个人迁入时间，因此不能完全区分20世纪90年代以后迁入者与较早迁入者。第三，其不能直接反映国籍变化、居留身份、职业类别和目的国内部地区分布。第四，其不同于按族群身份认同统计的华裔人口，后者可能包括本地出生者、早期移民后代以及部分新近迁入者，不能作为中国新移民规模、结构和空间分布的判断依据[①]。

因此，本文将联合国“出生地为中国”的国际移民存量数据作为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三国的中国新移民规模与结构比较的主要依据。全文关于中国新移民规模、占比、性别构成和类型归纳的分析，均以这一统计条件为基础。

三、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的中国新移民的规模变化

在厘清历史背景和统计条件之后，有必要进一步回到数据本身。以下将结合1990—2024年联合国国际移民存量数据，从绝对人数规模、在全部国际移民中的相对比重以及2015—2024年的近期变化三个方面，对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的中国新移民的规模变化进行比较分析。

（一）中国新移民人数规模及其基本特征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公布的国际移民存量数据，1990—2024年，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三国出生地为中国的移民人数整体规模较小，并未出现持续快速增长[②]。其中，斐济的中国来源移民人数在三国中相对最多，1990年为848人，2010年增至1072人，2024年为964人。整体来看，斐济的中国新移民人数长期保持在相对较高但波动不大的水平。

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的中国新移民人数则长期维持在百人上下。巴布亚新几内亚由1990年的135人降至2024年的87人，呈现小规模缓慢下降状态。汤加在1990—2010年由91人增至143人，但之后有所回落，2024年为109人。由此可见，三国的中国新移民并未出现“大量进入”或快速扩张的趋势。

表1　1990—2024年出生地为中国的移民人数

年份（年）	斐济（人）	巴布亚新几内亚（人）	汤加（人）
1990	848	135	91
1995	835	138	103
2000	869	103	115
2005	923	103	134
2010	1072	87	143
2015	925	88	122
2020	946	87	114
2024	964	87	109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2024，见其中“Bilateral migrant stock by origin and destination”及“Both sexes”数据模块。说明：本表为1990—2024年时段数据，2024年为该序列最新观测点；统计条件为“出生地为中国”的国际移民存量。

从表1可以看出，斐济的中国新移民数量明显多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但其增长并不持续；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的中国新移民数量则长期保持较小规模。尽管少量人口变化在地方社会中较易被感知，

①李明欢：《国际移民的定义与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②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2024*，POP/DB/MIG/Stock/Rev.2024.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但若仅从绝对人数和统计意义上看，三国的中国新移民均不属于大规模移民群体。

（二）中国新移民在全部国际移民中的比例

进一步考察中国新移民在全部国际移民中的比重，可以更清楚地判断其在当地国际移民结构中的相对位置[①]。1990—2024年，三国的中国新移民占全部国际移民的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斐济由1990年的1.3038%降至2024年的0.5325%；巴布亚新几内亚由0.5164%降至0.2482%；汤加由0.4560%降至0.2047%。

表2　1990—2024年出生地为中国的移民占全部国际移民比重

年份（年）	斐济（%）	巴布亚新几内亚（%）	汤加（%）
1990	1.3038	0.5164	0.4560
1995	1.0661	0.5033	0.4298
2000	0.8716	0.3842	0.4072
2005	0.7107	0.3697	0.4238
2010	0.6479	0.2822	0.4131
2015	0.5853	0.2563	0.3032
2020	0.5584	0.2524	0.2421
2024	0.5325	0.2482	0.2047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2024，见其中“Bilateral migrant stock by origin and destination”“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by destination（total）”及“Both sexes”数据模块。本表为1990—2024年时段数据，2024年为该序列最新观测点；占比根据中国来源移民存量与全部国际移民存量计算。

表2表明，虽然中国新移民在三国中具有一定存在感，但从国际移民总体结构看，其所占比例并不高，而且长期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一结果有助于修正仅凭个别观察或社会印象形成的判断。换言之，中国新移民在地方社会中可能受到关注，但这种关注并不能直接解释为其人口规模显著扩大或在国际移民结构中占据突出比例。

（三）近期变化及其解释边界：2015—2024年

上述分析表明，1990—2024年，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三国出生地为中国的移民总体保持小规模状态，在全部国际移民中的占比也呈下降趋势。为进一步观察其近期是否出现偏离长期趋势的扩张拐点，有必要在同一统计框架下对其2015—2024年的变化作简要说明。

从2015年、2020年和2024年三个观测点看，三国的中国新移民存量并未出现同步增长或快速扩张：斐济由2015年的925人增至2024年的964人，仅增加39人；巴布亚新几内亚由2015年的88人变为2024年的87人，基本保持稳定；汤加由2015年的122人降至2024年的109人，呈小幅下降态势。与此同时，三国的中国新移民占全部国际移民的比重继续下降：斐济由2015年的0.5853%降至2024年的0.5325%，巴布亚新几内亚由2015年的0.2563%降至2024年的0.2482%，汤加由2015年的0.3032%降至2024年的0.2047%。

这一近期变化与1990—2024年的长期趋势基本一致，说明近年来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在经贸合作、工程建设、教育交流和人员往来方面联系有所增强，但并未直接表现为按“出生地为中国”统计的长期移民存量明显增加。相关人员往来可能更多体现为短期商务、工程派驻、技术培训、项目流动或临时性工作

①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2024：Key Facts and Figures*，UN DESA/POP/2024/DC/NO.13，2024.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安排，而不必然沉淀为国际移民存量。因此，在解释太平洋岛国的中国新移民问题时，不宜简单将双边合作关系增强等同于中国新移民人口规模扩张，相关判断仍应限定在联合国对其出生地统计所能反映的移民存量层面。

四、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的中国新移民的结构比较

上述分析主要围绕三国的中国新移民的规模及其相对比重展开。然而，三国的中国新移民规模相近或占比较低并不意味着内部构成一致。为进一步揭示其中的结构差异，下文将主要从性别结构入手，比较三国出生地为中国的移民在群体构成上的不同特点，并为后文的类型归纳提供依据。

（一）性别结构差异

除人数规模和相对比例外，性别结构也是理解中国新移民群体特征的重要指标。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存量数据，2024年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出生地为中国的移民在性别构成上存在明显差异。

表3　2024年出生地为中国的移民性别结构

国家	女性（人）	男性（人）	合计（人）
斐济	443	521	964
巴布亚新几内亚	56	31	87
汤加	38	71	109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2024，见其中“Bilateral migrant stock by origin and destination”及“Sex（Female/Male/Both sexes）”数据模块。说明：本表为2024年最新观测点数据，用于反映三国的中国新移民性别结构差异。

由表3可见，斐济的中国新移民女性占比为45.95%，男女结构较为接近。这提示斐济的中国新移民并非单一短期务工群体，其移民因素可能包含经商、就业、家庭团聚和较长期居留等多种情形。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中国新移民女性占比为64.37%，女性明显多于男性，这提示该群体的形成可能与婚姻迁移、家庭团聚或亲属关系网络存在一定关联。汤加的中国新移民女性占比为34.86%，男性明显多于女性，显示其中国新移民具有不同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性别结构特征。

需要强调的是，性别比例本身不能直接证明具体职业、迁移原因或社会角色情况。本文对性别结构的解释属于基于现有统计指标作出的审慎推断，其作用在于提示不同国家的中国新移民构成因素可能存在差异，而不是对个体迁移路径作出确定性判断。

（二）三国的中国新移民结构指标比较

将人数规模、占全部国际移民比例、女性占比、长期变化和峰值年份因素综合起来，可以更清楚地展示三国的中国新移民的结构差异。

表4　2024年三国的中国新移民规模与结构指标对照表

国家	存量（人）	占全部国际移民比例（%）	女性占比（%）	1990—2024年净变化（人）	峰值（年—人）	结构特征
斐济	964	0.53	45.95	＋116	2010—1072	人数相对较多，男女结构较均衡
巴布亚新几内亚	87	0.25	64.37	－48	1995—138	人数较少，女性占比较高
汤加	109	0.20	34.86	＋18	2010—143	人数较少，男性占比较高

资料来源：根据表1—表3计算整理；峰值与峰值年份据表1识别。说明：表4以2024年为最新观测点，对三国的中国新移民规模、占比和性别结构作综合比较。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从表4看，斐济的中国新移民人数在三国中最多，性别结构也相对均衡。结合斐济较早形成华人社会的历史背景，可以认为其中国来源移民具有相对稳定、波动较小且性别结构接近均衡的特点[①]。本文强调的并不是其人口数量庞大，而是其在三国比较中具有相对较高的存量水平和较均衡的结构特征。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中国新移民人数较少，女性占比较高[②]。由于联合国国际移民存量数据无法精确识别个体迁移路径或职业分布，本文不对具体迁移动因进行确定性推断[③]。不过，从性别结构看，不排除这一群体的形成与婚姻迁移、家庭团聚和亲属网络存在一定关联。与斐济相比，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中国新移民规模较小；与汤加相比，其女性占比明显较高，因此具有较为突出的结构特征。

汤加的中国新移民人数同样较少，但男性占比较高。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中国新移民女性占比较高的结构不同，汤加表现出男性比例明显偏高的特点。基于现有联合国数据，本文只能确认其存量规模有限且男性比例偏高，不能直接证明其国内空间分布、职业构成或社会可见度等特征。

总体来看，三国的中国新移民总体规模虽小，但在数量水平、性别构成和长期变化方面仍存在明显区别。上述结构差异与前文所示2015—2024年小幅波动的规模变化相互印证，说明三国的中国来源移民的差异并非由单一年份数据偶然造成，而是在现有统计途径下呈现一定延续性。

五、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的中国新移民的类型归纳

在前文对规模变化、相对占比、近期变化和性别结构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三国的中国新移民进行类型归纳。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类型划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分类，而是基于现有统计条件对三国的中国新移民规模、占比和性别结构差异所作的概括。

表5　三国的中国新移民结构特点及类型概括

国家	2024年中国新移民存量（人）	性别结构	占全部国际移民比例（%）	主要特点	类型概括
斐济	964	女性占45.95%，男女较均衡	0.53%	人数相对较多，长期变化较平稳	稳定定居型
巴布亚新几内亚	87	女性占64.37%，女性占比较高	0.25%	人数较少，女性占比较高，可能与家庭、婚姻或亲属网络因素存在关联	家庭依附型
汤加	109	女性占34.86%，男性占比较高	0.20%	人数较少，男性比例明显偏高	小规模男性偏高型

资料来源：根据表1—表4及第三部分的第（三）小节相关内容归纳整理所得。说明：本表类型概括仅依据联合国“出生地为中国”的国际移民存量数据及其衍生指标，不以族群身份统计资料作为判断依据。

斐济的中国新移民类型可以概括为“稳定定居型”，主要依据是：其中国新移民人数在三国中相对较多，男女比例较为接近，长期变化幅度不大。该类型强调的是群体规模相对稳定和结构较为均衡，而不是人口数量庞大。结合斐济较早形成华人社会的历史背景，可以认为该国中国来源移民相对稳定且具有一定社会基础，但其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资料支持。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中国新移民类型可以概括为“家庭依附型”，主要依据是：其中国新移民人数较少，但女性占比较高。需要说明的是，“家庭依附型”并不意味着现有数据能够直接证明其具体迁移动因，而是

①Bessie Ng，Kumlin Ali，*Chinese in Fiji，Suva，Fiji：Institute of Pacific Studies*，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②Christine Inglis，*The Chinese of Papua New Guinea：From Settlers to Sojourners*，*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Vol.6，Nos.3-4，1997，pp.317-341.

③Anna Hayes，Rosita Henry，Michael Wood，eds.，*The Chinese in Papua New Guinea：Past，Present and Future*，Canberra：ANU Press，2024.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对其小规模和女性占比较高这一结构特征的审慎概括。现有联合国数据无法直接揭示个体迁移路径，因此不能据此断定具体迁移动因。不过，从性别结构看，该群体的形成可能与婚姻迁移、家庭团聚或亲属网络因素存在一定联系。

汤加的中国新移民类型可以概括为“小规模男性偏高型”，主要依据是：其中国新移民人数不多，在全部国际移民中占比也较低，但男性比例明显高于女性。基于现有联合国数据，只能确认其“小规模”和“男性偏高”两个结构特征，不能直接推断其国内空间分布、职业构成或社会可见度；因此，不能将其概括为“首都核心区高可见型”，也不宜用按族群身份认同统计的华裔人口资料作为类型判断依据。

这三种类型说明，中国新移民在太平洋岛国的结构表现并不一致。斐济的中国新移民人数相对较多且性别结构较均衡，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中国新移民人数较少且女性占比较高，汤加的中国新移民人数较少且男性占比较高。由此可见，分析太平洋岛国的中国新移民规模与结构，不能只看绝对人数，还应结合其在国际移民中的相对位置、性别结构和统计途径进行综合判断①。

六、结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三个国家中，出生地为中国的移民总体保持小规模状态，其在全部国际移民中的相对比重总体下降。2015—2024年的近期变化也未显示快速扩张趋势，说明这一群体并不是当地国际移民结构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但是，规模较小并不意味着结构差异不明显。本文的分析表明，三国的中国新移民在规模、占比和性别结构上仍存在较为清晰的差异：斐济的中国新移民人数相对较多，男女构成较均衡，可概括为“稳定定居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中国新移民人数较少，女性占比较高，可概括为“家庭依附型”；汤加的中国新移民人数同样较少，但男性占比较高，可概括为“小规模男性偏高型”。从2015—2024年的近期变化看，三国的中国来源移民存量仍未出现快速扩张，说明近年来三国的中国新移民人员往来和合作增强并未明显改变其小规模、低占比和相对平稳的基本格局。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判断均以明确的统计条件为前提。本文始终以联合国“出生地为中国”的国际移民存量数据为分析依据。按“出生地”统计的中国来源移民与按族群身份认同统计的华裔人口属于不同统计对象，前者反映跨国迁移存量，后者可能包含早期移民后代、本地出生者或归化者，二者不能相互替代。若不加区分地混合使用出生地统计、国籍统计和族群身份认同统计条件，容易高估中国新移民规模，也可能导致对其结构特征和社会影响的误判。

因此，今后研究可在现有国际移民统计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目的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社区调查、行业资料和田野访谈，以更准确地解释中国新移民在太平洋岛国社会中的实际位置。

①王聪，吉伟伟：《南太平洋岛国与华侨华人的互动发展研究》，《八桂侨刊》2018年第3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hold a dominant advantage), whereas Indian Americans have high voter turnout because of strong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because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be distributed in swing states (states where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are evenly matched). Second, their modes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differ: Chinese Americans rely on ethnic communities and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economy, while Indian Americans rely on tech elites to build cross-ethnic coalitions. Overall, Indian American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higher level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influence than Chinese Americans.

Keywords: Chinese Americans and Indian Americans; Electoral Politics;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Fiji, Papua New Guinea, and Tonga ····· **Lv Jianying(35)**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the overall population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has remained relatively small, although their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vary across countries. Focusing on Fiji, Papua New Guinea, and Tonga, this paper uses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data between 1990 to 2024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to compare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immigrants born in China, their share of the total international migrant population, and their gender composition in the three coun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pulation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all three countries has remained relatively small and generally stable from 1990 to 2024, with no rapid expansion during 2015-2024. Their share of the total international migrant population has also generally declined. However, significant structural differences exist across the three countries, which can be characterized respectively as "stable settlement" (Fiji), "family-dependent migration" (Papua New Guinea), and "small-scale migration with a relatively high proportion of males" (Tonga).

Keywords: New Chinese Immigrants;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Migrant Stock; Demographic Structure

Research on the Preserv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Nanyang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in Hainan·····**Zhou Yahui(42)**

Abstract: Hainan is an important hometow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China. Since the mid-19th century, large numbers of people from Hainan migrated to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giving rise to a distinctive Nanyang Chinese culture characterized by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Today, the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s of Haikou, Wenchang, Qionghai, and Wanning still preserve numerous cultural heritage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Nanyang.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cludes arcaded buildings and ancestral residences of overseas Chinese, whil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ncompasses beliefs in Mazu and Shuiwei Shengniang, as well as Nanyang-influenced culinary traditions such as Hainanese chicken rice, "Dad's Tea," kaya jam, and pandan cake. These reflect the convergence of Hainan and Nanyang in life skills and cultural expressions, while also embodying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emotional identities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s products of migration and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Hainan's Nanyang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local identity and promoting cross-region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is paper trac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forms of this heritage, explores its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its preservation, revitalization, and transmission in response to current challenges. These efforts are intende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deepen cross-cultural exchange.

Keywords: Hainan Overseas Chinese Hometowns; Nanyang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Anthropology; Transnational Memory

Research on the Value Composition, Challenges to Value Realization,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s of Quanzhou Qiaopi Arch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 **Lv Yaling(54)**

Abstract: Qiaopi archives bear witness to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encounters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hometowns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ir places of residence, and embody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as well as academic research value.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resource for preserving and transmitting the spirit of overseas Chinese, Qiaopi archives essentially embody the three-dimensional forms of value identified in Bourdieu's theory of cultural capital: objectified value (the physical Qiaopi documents), embodied value (the spirit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institutionalized value (their recognition through inclusion in international heritage registers). Thi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provide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further realizing the value of Qiaopi archives. It calls for a shift from traditional "rescue-oriented preservation" toward a more proactive strategy of "creative revitalization," with coordinated efforts in content transformation, intergenerational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ve operations. These efforts can facilita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ultural value of Qiaopi archives and contribute to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Qiaopi Archives; Cultural Capital; Value Realization; Quanzhou

Policy, Overseas Chinese Resources, and the Market: A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ommercial Management Model of Changshan Overseas Chinese Farm between 1952 and 1991·····**Hu Jiaoyang, Shi Hongjuan(59)**

Abstract: As the largest settlement base for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in Fujian Province, Changshan Overseas Chinese Farm underwent three distinct stages in the evolution of its commercial management model between 1952 and 1991, as an "agriculture-dependent supply-and-marketing model"during the initial stage (1952-1958), a "planning-led integrated model"during the development stage (1959-1978), and an "outward-oriented diversified model" during the transition stage (1979-1991). This evolution vividly reflects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among changes in national policies toward overseas Chinese affairs, the adaptation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hich together drove the shift of overseas Chinese farms from welfare-oriented operations toward market-oriented management. This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not only enabled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angshan Overseas Chinese Farm but also mark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is distinctive institution from a state-led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